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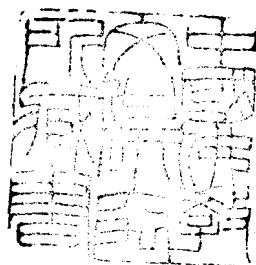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 
主編 張曼民

佛典翻譯史

大乘文化出版社

現代佛學術叢刊 (38)  
主編 張曼濤

佛典翻譯史論

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⑧

第四輯 八

## 佛典翻譯史論

全書(100冊) 定價：新台幣三萬六千元

(創辦人) 張曼清 美金一千元

主編：  
編輯者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督印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

董事長：褚一飛

發行人：曾惠蘭

出版者：大乘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108巷5號3樓

電話：五一一七〇七七一八

郵政劃撥：台北市一六九三三五號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1410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 
七十年七月二版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，請寄回掉換。

# 編輯旨趣

中國佛典的翻譯，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。先秦文化，到了東漢時期，已經走向衰勢低潮，就如一個人的身體一般，當發育健全，而無新的營養補給之時，便漸漸衰弱頹萎。就在此時，恰好佛教傳來，一個完全不同質素的語言、文化系統，由熱誠的傳教者，從千山萬水的遙遠處携來。於是新的補給品傳到，豐富的營養遞進，一個新的異域文化打開，我國的知識學界、文化人士開始有了新的學習，新的刺激，於是佛典的翻譯，便成為當時國家的第一件大事。由東漢的安世高、支婁迦讖，到魏晉的來華譯人，再到唐宋本國的譯經大師，八百多年的傳譯媒介，使整個中國文化發生了強大的空前變動，既吸收了新的文化血液，又豐富了自家的思想靈魂，於是乃益臻文化大國的佳境。這便是我國自漢以來，第一期的文化大開，迎接新潮，佛典的翻譯史論，便是此一迎接過程的總證。

二、本書所收各文，雖不能盡括中國佛教所有的翻譯史實，或譯介上的特別問題，但全盤的翻譯

過程和重點，亦大致收羅齊盡。只是譯人的統計和重大譯師的介紹，未能盡入此書，乃是稍感唯一的缺點，蓋因本書原定的目標便是如此，如欲以集各大譯師的譯述介紹，則篇幅不僅容納不下，且也打破了其他專集的體例。如「玄奘大師研究」，其中就有專文敘述他一生的譯業功績，若將其轉入本書，則失去了玄奘研究的全面性，若兩書均選，便又失諸重複。他如羅什、義淨等大師均是如此。故凡可獨立專集，或另入他集者，均不在本書目標之內。

三、本書共收十四篇，前九篇就譯史而論，後五篇就譯事而論，兩者都極重要，故合併之，總題爲：「佛典翻譯史論」。最後一篇任繼愈氏的「佛經的翻譯」，雖然作者後期的東西，心態已變，格調不一；就文論文，本文仍有其選入的價值，且觀點、結論都有其可取之處，故仍收入本書，聊備參考。

# 佛典翻譯史論 目錄

初期佛教翻譯事業的概況	參	話	一
古代來華講學的西方譯人	谷	響	一一
安世高所譯經的研究	毓	之	三一
兜率聖典翻譯史	談	玄	四五
真諦三藏譯述考	蘇公望	六七	
唐代天竺僧侶東來譯經考	黃敏枝	一〇九	
五代及宋代中印佛教僧侶的往來與譯經	關德棟	一一九	
宋元明清譯經圖紀	周叔迦	一二九	
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界之譯續	續明	一六三	
佛教譯經制度考	五老舊侶	一七一	

- 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 ..... 曹仕邦 ..... 一八七  
佛典之翻譯 ..... 梁啟超 ..... 一八三  
佛經翻譯論 ..... 羅根澤 ..... 三六三  
佛經的翻譯 ..... 任繼愈 ..... 三八七

# 初期佛教翻譯事業的概況

## 參 話

### 一、佛教翻譯事業開始的時期

中國翻譯史，應當開始在什麼時期，截至現在為止，還沒有定論，據韓詩外傳（漢韓嬰撰）說：「成王（周朝的第二代君主）之時，越裳氏（故地在現在越南的南境）重九譯（所謂九，是說言語不通，須經過多次的輾轉相譯）而至，獻白雉於周公。」後漢書（南朝宋范曄撰）南蠻傳也說：「交趾之南，有越裳國，周公居攝，越裳以三象（見下文）重譯而獻白雉。」成王在位的年代，是公元前一一二五年到一〇七八年；而周公攝政的年代，是成王的初年；這便是譯事見於史傳最早的時期。雖然，在周朝以前，像唐、虞、夏、商各朝，也有和鄰近的國家交往，像所謂「會諸侯」、「撫四夷」的史實，當然也就有譯事，但是已經沒有文獻可以作為徵引了。其次，據禮記漢戴聖所記王制篇所說，周朝還設置有職掌四方語言的譯官；職掌東方語言的，叫做「寄」；職掌南、西、北三方語言的，以

次叫做「象」、「狄鞮」和「譯」。現在所謂翻譯的「譯」字，就從王制所說「北方曰譯」出來。而這個「譯」字的解釋，王制的疏釋說：「譯，陳也，謂陳說內外之言。」又周禮（東漢何休說是六國時人所撰）秋官的疏釋說：「譯卽易，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。」那麼，爲甚麼寄、象、狄鞮、譯四種當中，後世獨用了「譯」字，而把其餘三種都廢棄呢？據翻譯名義集（宋法雲撰）說：「今通西言而云譯者，蓋漢世多事北方，而譯官兼善西語，故廢騰始至而譯四十二章，因稱譯也。」就是說，把換易四方的語言統稱做譯，是從漢朝起的。而「翻譯」這個成語，初見於史傳，却是隨書（唐錢徵等撰）經籍志。在周朝以後，秦漢兩朝也設置有譯官，叫做「九譯令」（見漢書昭帝紀注），可見從周到漢，譯事是很盛的。但是從上面所說看起來，這個期間的譯事，只是關於外交語言的翻譯而已；當時的中國，把四圍的國家，叫做四夷，所謂東夷、西戎、南蠻、北狄，以爲他們的文化比中國低得多，甚至於沒有文化，所以有關文化的翻譯，差不多沒有。到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才有关於宗教信仰、學術思想、文學作品的翻譯，才有義理宏深、文學優美的翻譯，才有日新月異、雲蒸霞蔚、綿延一千多年的翻譯，所以假如講到中國翻譯史，就不得不拿佛典的翻譯做第一章，而且從漢末到元初，不得不拿佛教翻譯事業做主體。

這樣說來，那麼，佛教翻譯事業開始在什麼時期呢？關於佛教初傳入中國的年代，異說很多，然而佛教撰述的大部分，以及佛教以外說到佛教的撰述，多半說是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六七

年）；至於佛教翻譯事業的開始，也就是在這個年代；而最初的譯人，是中天竺（印度古稱）沙門（印度出家修道者的稱呼）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；第一部譯成的典籍是四十二章經。關於這一傳說的記載，散見於後漢紀（晉袁宏撰）、後漢書、歷代三寶紀（隋賈長房撰）、佛祖統紀（宋志磐撰）、佛祖歷代通載（元念常撰）等書，其中明確記載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是在永平十年的，是佛祖統紀。統紀的記載，是摘錄三寶紀的記載而成。佛家一般所傳述，就是採用這個記載，現在把原文轉載如下：

七年（永平）帝（明帝）夢金人丈六，項佩日光，飛行殿庭。旦問羣臣，莫能對。太史傅毅進曰：「臣聞周昭之時，西方有聖人者出，其名曰佛。」帝乃遣中郎將蔡愔、秦景、博士王遵等十八人，使西域，訪求佛道。

十年，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，遇迦葉摩騰、竺法蘭，得佛倚像並梵本經六十萬言。載以白馬，達雒陽。騰、蘭以沙門服謁見，館於鴻臚寺。

十一年，勅雒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，摩騰始譯四十二章經，藏梵本於蘭臺石室，圖佛像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。

近代佛教史家，因為關於漢明帝求法的年代，以及他所派遣的使者，使者所到達的地方和使者的作用，有種種異說，以至於懷疑到明帝是不是有求法這件事，騰、蘭是不是實在有這兩個人。然而這個史實散見羣書，而且在東晉初年已經見於後趙著作——王度的奏章，可見流傳已久，並非

毫無故實。至於史實的互有出入，或者因為佛教剛傳入中國，傳聞異辭；怎麼可以驟然武斷爲全屬虛構呢？其次，關於四十二章經，出三藏記集（梁僧祐撰）說：「古經現在，莫先於四十二章。」然而近代佛教史家，也因為它的文體，類似魏晉以後；它的體裁、類似道德經和孝經，於是又武斷爲後世的僞作，而不是從梵本譯出；因此佛教翻譯事業開始在漢明帝時代一說，發生動搖。但是這種斷案，是對於佛典翻譯史沒有仔細研究的錯誤，我們知道三國時代，東吳有一位翻譯大家，叫做支謙，他不但翻譯了許多梵本經典，並且喜歡把前人的譯本拿來刪正潤色，像三寶紀說他「正前翻多譯語者」，又古今譯經圖紀（唐靖邊撰）說他「正舊譯新」。三寶紀在支謙條說，著錄四十二章經。同時又說：「第二出，與摩騰本小異。」但是出三藏記的成書，遠在三寶紀以前，在支謙條下，却沒有著錄四十二章經的話，也沒有在支謙傳裏說起，可見所謂第二出的四十二章經，也就是支謙把摩騰的譯本拿來刪正潤色的，所以只和摩騰本小異，而三寶紀却誤認做重譯本了。由此可以反證四十二章經，確實有摩騰本，不過在支謙的刪正本行世以後，因為「辭質多胡音」，不及支謙本的「文義允正，辭句可觀」，於是湮沒不彰了。但是刪正本既然只和原譯本小異，那就一定保存了許多原譯本的面目，像東漢襄楷上桓帝的奏章，當中說到「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不欲欠生恩愛」，又「天神遺以好女，浮屠曰：此但革囊盛血，遂不盼之。」等等，和現存麗本四十二章經第三章和第二十五章所說，大略相同；可以推知是採用四十二章經的辭意的，那就說明了

這本經的原譯本，在桓帝的時代是確實存在的；而在桓帝以前，已經傳入，可以斷言。然而明帝以後，中國和西域間佛教上的交通，差不多斷絕八十年，那麼這本經的傳入，就不能不把它歸到明帝的時代了。根據上面的種種理由，我們可以說，佛教翻譯事業，是開始在東漢明帝時代；最初的譯人，是迦葉摩騰；最初的譯籍，是四十二章經。

## 二、東漢時代的佛教翻譯事業

依開元釋教錄（唐智昇撰），從明帝永平十年到獻帝延康元年（公元二一〇年），共一百五十四年之間，傳譯的人數，計十二人；譯本的部數，計二百九十二部；現在把這十二位早期的譯人和他的譯業介紹一點：

一、迦葉摩騰 中天竺人，通大小乘經，公元六七年，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法，遇見他，要請他到中國來。摩騰以傳播佛法為志願，不憚疲苦，冒涉流沙，到洛陽，譯出四十二章經一卷，後來不知所終。

二、竺法蘭 也是中天竺人，蔡愔等往天竺，追隨摩騰，到洛陽，不多時就通習華言，譯出蔡愔在西域所獲得的佛典五部，其中四部失傳，一部就是和摩騰同譯的四十二章經，後來死在洛陽，年六十餘歲。

三、安世高 名字叫做清，世高是他的別號，本來是安息國王的太子，後來出家學道，博通經藏，足跡遍歷各國，以弘布佛法為終身的工作，於漢桓帝的初年（公元一四七年），到洛陽，不久就通習華言，從桓帝建和二年（公元一四八年）到靈帝建寧四年（公元一七一年）二十多年之間，譯出安般守意經，陰持入經等。在洛陽宣譯事畢，關洛擾亂，於是到江南去遊化，後來就死在南方。出三藏記記載他所譯出的佛典，共三十五部，又作三十四部，高僧傳（梁慧皎撰）作三十九部，三寶紀作一百七十六部，內典錄（唐道宣撰）作一百七十餘部，開元錄作九十五部，現在依從開元錄。

四、支婁迦讖 簡稱支讖，月支人。他誦讀過很多經典，弘法的志願很切，於桓帝永康元年（公元一六七年），到洛陽，在靈帝光和、中平（公元一七八—一八九年）十餘年之間，譯出般若道行經、般舟三昧經等。出三藏記記載他所譯出的佛典，共十四部，三寶紀作二十一部，內典錄同，開元錄作二十三部。

五、竺佛朔 天竺人，支讖洛陽傳譯的時候，佛朔也攜帶道行經的譯本前來，隨即把它翻譯做漢文，據說後來又翻譯般舟三昧經，支讖替他傳語，洛陽孟福、張蓮筆受。

六、安玄 安息人，也是在靈帝的時代到洛陽，漸解華言，光和四年公元一八一年，和臨淮嚴佛調同譯出法鏡經一部，玄口譯，佛調筆受。

七、支曜 經錄汎稱做西域人，於靈帝中平年間，在洛陽，譯出成具光明經，出三藏記記載

他所譯出的佛典只有這一部，三寶紀作十一部，內典錄同，開元錄作十部。

八、康巨 汎稱西域人，於靈帝中平四年（公元一八七年），在洛陽，譯出閻地獄事經一部。

九、嚴佛調 中國臨淮郡人，出三藏記說他「綺年穎悟，敏而好學，信慧自然。」他出家修道後，深通梵文，和安玄對譯。靈帝中平五年，在洛陽，譯出孺首菩薩經等，三寶紀記載他所譯出的佛典，共七部，內典錄同，開元錄作五部。

十、康孟詳 康居人，於獻帝興平元年（公元一九四年）到建安四年（公元一九九年），在洛陽，譯出遊四衢經等，出三藏記說他譯出中本起經，高僧傳說他譯出中本起經同修行起經，三寶紀、內典錄、開元錄，都作六部。

十一、竺大力 汎稱西域人，獻帝建安二年（公元一九七年），在洛陽，由康孟詳傳語，譯出修行本起經一部。

十二、曇果 汎稱西域人，建安十二年（公元二〇七年），在洛陽，由康孟詳傳語，譯出中本起經一部。

現在再把這十二位譯人譯籍列表如左：

譯人	國籍	譯本部數	翻譯年代（公元）	類別
一、迦葉摩騰	天竺	一部	六七年	經
初期佛教翻譯事業的概況			七	

二、竺法蘭	天竺	四部	六七年	經
三、安世高	安息	九十五部	一四八一—七一年	經律集
四、支婁迦讖	月支	二十三部	一七八一—八九年	經集
五、竺佛朔	天竺	二部	一七九年	經
六、安玄	安息	二部	一八一年	集
七、支曜	西域	十部	一八四一—八九年	經集
八、康巨	西域	一部	一八七年	經
九、嚴佛調	中國	五部	一八八年	經
十、康孟詳	康居	六部	一九四一—九九年	經律
十一、竺大力	西域	一部	一九七年	經
十二、曇果	西域	一部	二〇七年	經
合計——一百五十一部				
新舊諸失譯經——一百四十一部	二百九十二部			

這十二部譯人中，在佛典翻譯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是安世高、支讖和嚴佛調。世高和支讖，是佛典翻譯初期的兩位大師，佛典翻譯事業，雖然開始於漢明帝時代，然而摩騰、法蘭的譯本，已

經散佚，沒有文獻可以考證；後來的發展，更不明瞭；所以明確的佛典翻譯史，應該說是發端於永平以後八十年的安世高和支識。

世高所譯出的佛典，依古錄，多半屬於小乘，又多半是四阿含經中一部分的抽譯，例如長阿含十報法經，就是長阿含的十上經；一切流攝守因經，就是中阿含的漏盡經等類。其次，世高是禪觀的學者，所以所譯出的佛典，又以關於禪觀修行為多，例如安般守意經、禪行法想經、道地經都是。出三藏記稱讚他的譯本說：「義理明析，文字允正。」

支識所譯出的佛典，差不多都屬於大乘，佛敎目錄學家，把屬於大乘的佛典，歸納做般若、寶積、大集、華嚴、涅槃五大部，支識於五大部，差不多都有抽譯，例如道行般若經，就是大般若第四會；無量清淨平等覺經，就是大集賢護經等類。出三藏記稱讚他的譯本說：「皆審得本旨」，又合首楞嚴經所說：「凡所出經，類多深玄」。

嚴佛調是中國佛徒從事佛典翻譯工作的開山元勳，是後來法顯、玄奘、義淨的先導，當時參加佛典翻譯的雖還有孟福、張蓮等人，然而他們不過筆受而已，只有佛調，深通梵文，又自譯佛典，而且他的譯筆，和安世高、安玄齊名，因此號為「難繼」。

在這個時期，佛典翻譯事業還在草創，本來許多的佛典像四阿含、般若、寶積、大集、華嚴等經，大都具有叢書的性質，卷帙浩繁，初期的譯人，在譯事所必需的條件還沒有具備之下（例如譯人

和筆受人，都未必華梵兼通；又譯籍並沒有原本，全仗譯人口誦，或者雖然有而不完全），自然難以勝任愉快，所以採取一種抽譯的方法，就是不把全本或者全部整個譯出，而是把它的一部分抽出來傳譯單行，例如安世高以次的譯本，大都如此，而四十二章經，更是抄集許多經典的要義的。

其次，初期的譯人，多半「方言未融」，所以大都採取直譯的方法，而且不免是幼稚的、粗糙的，像安世高的譯本，有「質而不野」（出三藏記）、「貴本不飾」（大十二門經序）的評語；支謐的譯本，有「了不加飾」（出三藏記）、「貴尚實中，不存文飾」（合首楞嚴經記）的評語；竺佛朔的譯本，有「棄文存質」（出三藏記）的評語；支曜、康巨的譯本，有「並言真理旨，不加潤飾」（同上）的評語；所謂「質」，所謂「貴本」，所謂「不存文飾」等等，便都是直譯的意思。總之，這個時期的譯業，不過是篳路藍縷而已。